

石城 安顺

戴明賢集

第一卷

戴明賢 著

GUANGDONG
LIBRARY
广东作协

石城 安顺

Shicheng Anshun

戴明贤系

第一卷

戴明贤 著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城安顺 / 戴明贤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11

(戴明贤集: 1)

ISBN 978-7-5495-8980-7

I. ①石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408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: 524002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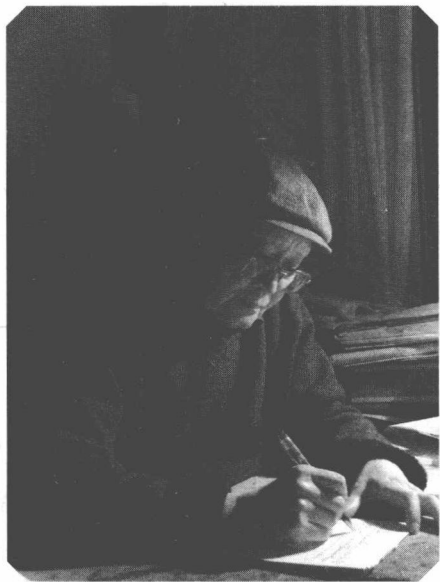
印张: 9.5 字数: 190 千字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作者简介



戴明贤，男，汉族，一九三五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西泠印社社员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编审职称。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。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主席、名誉主席，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贵州省芙蓉印社社长，贵阳书画院院长，《花溪》文学月刊副主编，贵州省政协委员，贵阳市政协常委，贵州省政协书画院名誉主席，贵州省人大书画院名誉主席等职务。

专业从事文学、书法创作。

文字作品有《一个人的安顺》、《物之物语》、《子午山孩：郑珍诗传》、《岔河涨水》（儿童文学短篇小说集）、《走进云里去》（长篇儿童文学）、《九疑烟尘》、《花溅泪》、《残荷》、《戴明贤散文小说选》、《采蕨集》、《石城引》、《掬艺录》、《黑白记》、《戴明贤书法篆刻集》、《对山集》、《戴明贤书印集》等出版。

戏剧影视作品有《夜郎新传》(舞剧)、《毕升》(电影,与廖公弦合作)、《双婚疑案》(电视连续剧)、《树苗》(美术片)、《燕楼惊豹》(木偶剧)、《水寨龙珠》(木偶剧)等拍摄、公演并获奖。其中,儿童短篇小说《报矿》获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;编剧的儿童舞剧《夜郎新传》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;儿童木偶剧《诺德仲与豹子精》获“金狮奖”第二届全国木偶皮影比赛铜奖,儿童木偶剧《水寨龙珠》获第21届国际木联大会暨国际木偶艺术节优秀剧目奖。

书法篆刻方面,幼年受家庭影响,喜书法篆刻,请益于学者书法家陈恒安先生。据不完全统计:作品曾百余次在国内外展览、收藏及获奖。在黄河碑林、寒山寺碑林、王铎纪念馆、马鞍山李白纪念馆、翰园碑林等三十余处刻石。2001年获中国书协中国书法艺术荣誉奖,2011年获建会三十周年荣誉奖。

“该临流映照，在这岁月的长河上，我留下了点什么？

而在这水波上，我又能留下点什么？”

——唐湜

总 序

八十之年,能有机会选编一套文集,可谓幸甚;书稿粗定,喜后之愧又袭上心头;弄了大半辈子笔头,这张答卷未免寒酸了些。诗人唐湜在为三十五年前旧作写的序言中说:“该临流映照,在这岁月的长河上,我留下了点什么?而在这水波上,我又能留下点什么?”逝者如斯,我能留下的少而又少。

我从小嗜读闲书,放学回家,进大门就掏出小说走着看,穿过三个小院,进屋连人带书包倒在床上继续看,看到吃中饭才放下。进了中学,图书馆数我借书最勤。直到现在老眼昏花,仍是不可一日不读书。后来走上写作这条路,一些“不懂行”的长辈和同学认为是顺理成章,不知道读书和写作是两回事。我很明白自己的劣势:人生平淡,涉

世不深；读书杂乱无序，囫圇吞枣。这两条正是文学写作的致命伤。再加上不善于自我规划，种种念头，十不偿一，到头来只能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。

我的写作历程，非常醒目地分为两截：“文革”前十年总共不到十万字；文革后四十年大约一百五十万字，两截之间是十年空白。年龄和阅历固然也是原因，但主要是时代使然。在我这个年龄段的文友中，类似的例子不少。

我学习写作，开始是写诗。一九五六年读到艾青的叙事诗《黑鳗》，觉得这种体裁好学，就用一位乡兄讲述的民间传说，写了一首《鱼鹰王》，寄给韦君宜主编的《文艺学习》，居然给刊出了，还配了几句编者评论。后来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些民歌体的短诗，但很快就明白自己无诗才，及时抽身，不再花精力做无用工。

不写诗了，也写不成小说。当时文艺政策是写工农兵，我从家门到校门、从校门到机关门，对三种法定主人公根本摸不着风。一九六〇年年底，因“大跃进”运动造成的大饥谨达于极点，我奉派参加农村整风整社工作队，去到乌蒙山区农村。这段经历，于我是一堂震撼灵魂的人生大课，

让我睁开了正视社会的眼睛。近一年后回城,觉得有点生活基础了,才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《包谷熟了》,采用的还是“背面敷粉”的手法,主人公是个农村小孩,肤浅得很。后来调入新闻部门,又奉派参加报告文学写作组,在黔北一个地气回暖的富裕村寨,与农民朝夕相处了大半年,写出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纪实散文《夫妻》。但随即来了“四清”运动,仓皇离村回单位参加运动,这篇《夫妻》也和同组文友们的文稿一并上缴销毁。机关运动结束后,我被下放乌蒙山区当中学教师。

从省城突然到山区,没有了书店、影院、剧场这几项城市因之可喜的“硬件”[其实当时这三“硬件”也都有名无实了],没有了可以聊文学艺术的朋友,一时间难以适应,浑然不知这是塞翁之福:不到半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横空出世,搅得周天寒彻,我才发现上天把我从大漩涡送进了避风港。原在单位[省广播电台]的同事们卷入政治狂潮,兄弟阋墙,此消彼长,把时间精力用来打派仗,争话语权;而我在大山里却白拿工资读闲书。山区中学固然无什么藏书,随身带去的百来本却都是耐读的经典。从小爱好的篆刻书法也捡起重温。但心境很荒芜,很茫然,因为省城里,还有父母亲

人[我家被居民委员带着“红小兵”抄了两次];我自己头上也不知会不会掉下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正在阅读的书世界中,常与妹妹书信和造反小报所描绘的现实世界相交错,引发种种联想。当时对写作已完全绝念,完全没想到还会有一天,能把这些联想中的人物[顾贞观、纳兰容若、龚自珍、秦桧、朱熹等]一一写出来。

一九七二年冬,忽然间峰回路转,几个“样板戏”一统天下的局面受到极峰斥责,各省市又开始“大抓”戏剧创作,这股东风把我吹离山乡,吹到贵阳剧团任编剧,写了两三个本子。一九八〇年参加筹建贵阳市文联,算是得其所哉:协会和刊物工作为正业;写作为副业。于是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小说、散文随笔、戏剧影视,乘兴而作,兴尽而止,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。一九九八年退休后,烦人的事没有了,读书、写作和书法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,几本有整体构思的书都是退休后写的。

退休后几乎专写散文了。上中学时从语文老师袁愈荃先生借得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来读,特别喜欢的是周作人和郁达夫选编的两卷散文。但后来学习写作,却不敢涉足散文。那时文学只准以无产阶级感情写工农兵,流露个人情绪是大忌。

从延安进北京的作家萧也牧写了个中篇小说《我们夫妇之间》，就被认为有“小资情调”而弄到革职潦倒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“伤痕文学”冲决雷池，局面改观，我才写了第一篇散文《蚕思茧绪》，发表在新办的《创作》丛刊上。一九七九年前后，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吴培华女士到贵州组稿，省作协为她约了一些作者分别交谈。我说自己阅世不深，只宜写散文和历史题材的小说；她记住这话，回去后来信约稿。我寄了篇《乌蒙杜鹃》去，承她很快发了。以此开始，我陆续寄去六七篇，她都发在了《大地》副刊上。小说只寄过一篇写龚自珍的《放梅》，终审认为不合时宜，毙了；她把编稿寄还给我，几年后重写为《落红》，发在《花溪》上。培华女士年纪比我大，不久就退休了。后来我几次想联系她未果，最近偶然有个机会，却得知她已谢世了。我一直感念这位老大姐。

系统地写陈年旧事，始于《一个人的安顺》。童年记忆一大堆，几十年里一直贮藏在心里。原计划写成小说，还几次设计过人物，拟过大纲。但总是不对劲，那些散乱的人和事顽强地拒绝合并、归纳和改造，故事怎么编都觉得落套，一搁几年。偶然在书店见到帕乌斯托夫斯基〔是我青年时代

非常喜欢的作家]自传体小说《一生的故事》，皇皇巨帙由众多带标题的小故事组成。我从这种结构得到启发，决定写成一部积木型的系列散文。先是在故乡的《安顺晚报》连载，载完后将全稿传给挚友钱理群兄看。他在安顺工作过十七年，读了很高兴，不仅为写长序，还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杜丽女士。几天后接到杜女士电话，说决定做成图文书，让我尽快搜集一批老照片寄去。这样顺利和快速，出乎我的想象。而且，她通过电话了解我的写作计划后，就提出往下做“贵州人贵州事”书系的想法。一位翻译家在文章里说：一本书的作、译者遇上什么样的编辑，是至关重要的。我很幸运。以后此书收入《人与岁月》丛书，她又编了一次，对内容十分熟悉。几年后与其妹玲玲游安顺，许多地方和物事她都能联系起文字来；我的老乡们也看她俩跟老朋友一样。后来的《物之物语》和再晚些的《茶味行役》也是由她做的。这三本系列散文，基本上反映了我从小到老的亲身经历。有一位年轻朋友好意要为我写传，我敬谢不敏，他不屈不挠，拉出一份年表交我核实，我就扣住不还了。我辈岂配立传。如从平民生涯也是时代和社会的旁注这个角度说，这三本

小书也就可视为我的自传。我从小到大用眼多用嘴少,动脑多动手少,往好里说顶多一“草根观察员”,我这个“传主”是活在别人身上的。

小说两卷,一卷为历史题材,一卷为儿童题材。前一类是神驰百代,心系今生;后一类是因为我天生喜欢观察幼儿,他们的说话和行为常令我惊喜不已,趣味无穷。小时候最早读到的外国小说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和《简爱》,印象最深的也是主人公童年生活部分。但我写儿童,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儿童文学,比较适合于我这样喜欢小孩的成人读者,类似契诃夫的《万卡》这种以成人趣味写小孩的作品,他的集子里有多篇这种小说。

《子午山孩:郑珍人与诗》是我的一次尝试:用一种“人诗互证”的写法,让我喜爱的这位贵州大诗人、被誉为“清诗冠冕”的郑珍[子尹]走下学者的书架,走进普通读者的视界。这本书的责编仍然是杜丽女士,并得素所尊敬的诗人邵燕祥先生为撰序文。

芜杂文字两卷,一卷偏于人事,一卷偏于议论;选自历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长短文字。

编入本集的文字,大多作了一次文字手术,只令瘦身,不变原意。我是个语言简约主义者,视赘

字赘句为寇仇,一见就打,不能自己。这次就算是定稿罢。

因容量有限,现实题材小说、戏剧影视脚本,以及书法篆刻作品,都不在编选范围之内。

前人有一句含着苦笑的诗“少不如人今且老”,正是我此时的心情。

二〇一六年元月十六日于适斋雨霁

序：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

钱理群

这本书写的“安顺”，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第二故乡。明贤先生更是“神交已久”而“一见如故”的朋友。但是，我要说，真正认识安顺这座城，认识明贤先生和他的家庭，真正走进这“城”与“人”的“心灵”深处，却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；这也是我为之动心，甚至受到震撼的原因所在。

是的，我在那里生活、工作了十八年，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我至今都依稀记得，但我对世世辈辈根植在这块土地上的安顺普通百姓，他们的日常生活、习俗，他们的情感、内心渴求，他们的行为方式、人际关系、思维习惯……其实是十分陌生的，识其“面”而不知其“心”，我只不过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匆匆行走的“过客”。突然意识到这一点，对于自称热爱安顺的我，是难堪而痛苦的。

因为这或许涉及更大的一个问题，去年我和明贤先生一起编选《贵州读本》时即已提出过：“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？”《一个人的安顺》让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，而且有了新的思考。我发现自己的一生

竟是在不断的迁徙、奔走中度过的,于是,许多的城市:重庆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北京、安顺……都和我发生过关系,却都不深,缺乏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肉联系。这也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:走到哪里,都是关在校园或公寓的封闭环境中,过着与世俗生活隔离的书斋生涯(我在安顺的十八年也是这么度过的),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从看似凡俗、具体、琐细,其实是更生动、活泼,也更真实的人的生活土壤中拔出,成了“无根的人”。这样的人的无根化的悲剧,恐怕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,它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根源:应该说迅速变化流动的现代生活本身,极容易使人成为失根的漂泊者;而我们那个时代对人的世俗生活的绝对排斥(一律斥为“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情调”),对人的“纯精神化”的要求与精心培植,就自然会产生像我这样的畸形人。据我的观察与感受,前一方面的问题将随着全球性的流动变得更加突出与复杂;而后一方面的问题,却并不具有普遍性,甚至出现了反向的排斥精神的现象。应该警惕的倒是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与表现,也变成是纯物质的,而忽略了其精神内核:这也是一种消解,而且是根本性的。我也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本书的叙述的价值。它将中国边地小城市民的日常生活、风俗习惯……如此真实而精微、具体可触地呈现给我们,这对我辈“不知俗事”的偏颇,自是一个有力的纠正。而作者对世俗生活背后的普通百姓的生命存在形态、精神面貌、命运……的关注,及其内在诗意的发掘,处处流露出对生息于故土之上的乡亲父老的深切理解,以及相濡以沫的悲悯情怀,则更有助于读者接近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。这大概就是本书的格外动人之处。

处吧。

据我所知,本书最初命名为《石城浮世绘》,作者显然有描绘市民生活中的人情世态,以展现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的历史风貌的自觉追求。这或许是我更感兴趣的,于是更以一种学术的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本书:它正是我多年追求而不得的。

我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: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,往往有“事”而无“人”,或者有“大事”而无日常生活的“小事”,有帝王将相学者名人“大人物”而无普通平民百姓“小人物”,有人的“外在行为”而无人的“内心世界”。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一种颇为狭窄、机械与粗糙的历史观的。因此,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,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目标:一定要把研究的触角伸向“普通百姓家”的日常生活,将战争与文学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。为此我作了许多努力,包括大量查阅当时的报刊与有关回忆录,虽略有所获而“沾沾自喜”,又为远不及理想而沮丧。因此,当凭借明贤先生的生花妙笔,如此丰富多彩的关于战时教育、文化艺术、商业、警务、宗教,关于民间习俗、餐饮、缝纫、娱乐……方方面面的“清明河上图”式的生活长卷一一展现眼前;这么多的战乱中的小城人物:“慈心与侠气兼备”的大姐,“始终娇慵着”的下江女人与“始终殷勤着”的下江男人,“披着灰白色的擗毡大氅,无比剽悍”的马哥头儿,“气质高洁”、“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”,有一支“维纳斯铅笔”、记忆中永远是一个“漂亮的大孩子”的裁缝师傅薛大哥,“洒脱和妩媚”的昌明和尚,并称“龙虎豹”的山城名师,还有“踽踽而